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

會館建築 · 祠堂建築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 11 會館建築·祠堂建築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
第11卷 會館建築·祠堂建築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第(11)卷,會館建築·祠堂建築/
巫紀光,柳肅著。—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3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ISBN 7-112-04791-9

I. 中… II. ①巫… ②柳… III. ①建築藝術—
中國—圖集②祠堂—古建築—中國—圖集③會館公所
—古建築—中國—圖集 IV. TU-881.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2)第063197號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本卷主編 巫紀光 柳肅

出版者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北京百萬莊)

責任編輯 王伯揚

總體設計 雲 鶴

本卷設計 何冬燕

印製總監 楊一貴

製版者 北京利豐雅高長城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者 利豐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發行者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二〇〇三年三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7-112-04791-9/TU · 4272(9042)

國內版定價 三五〇圓

版權所有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周千峙 建設部顧問、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

副主任委員

王伯揚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編審、副總編輯

委員（按姓氏筆劃排列）

侯幼彬 哈爾濱建築大學教授

孫大章 中國建築技術研究院研究員

陸元鼎 華南理工大學教授

鄒德儂 天津大學教授

楊嵩林 重慶建築大學教授

楊毅生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編審

趙立瀛 西安建築科技大學教授

潘谷西 東南大學教授

樓慶西 清華大學教授

廬濟威 同濟大學教授

本卷主編

（會館）

巫紀光 湖南大學教授

柳肅 湖南大學教授

張衛 湖南大學副教授

（祠堂）

柳肅 湖南大學教授

巫紀光 湖南大學教授

攝影

柳肅 巫紀光 汪建武

石逸 吳志勇 張衛

凡例

一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共二十四卷，按建築類別、年代和地區編排，力求全面展示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的成就。

二 按編委會的原安排，本全集第十卷應為『祠堂建築』第十一卷應為『會館建築·書院建築』，兩書均由湖南大學編著。但在調研與搜集資料過程中發現，書院建築遺存數量較多，資料較為豐富，而會館建築和祠堂建築資料相對較少。因此將全集卷目作適當調整，第十卷改為『書院建築』，第十一卷改為『會館建築·祠堂建築』。本書為《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第十一卷『會館建築·祠堂建築』。

三 本書圖版按會館和祠堂的分布地域編排，詳盡展示了我國會館建築和祠堂建築在使用功能與空間構成特徵、建築造型、建築藝術風格及裝飾做法等方面的主要成就及其藝術特色。

四 卷首載有論文《會館建築藝術概論》和《祠堂的建築藝術》，概要論述了會館建築和祠堂建築的起源和發展、性質和種類、使用功能與建築形式、裝飾藝術和地方特點。其後的圖版部分精選了二百一十六幅會館建築和祠堂建築照片。卷末的圖版說明對前述照片做了簡要的文字說明。

會館建築藝術概論

巫紀光 柳肅

在中國古代各類建築中，會館是較晚形成的一種建築類型，它是由商業、手工業行會或外地移民集資興建的一種公共活動場所，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殊的公共建築。

會館按性質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行業性會館，一類是地域性會館。行業性會館是由不同行業的商人、手工業者興建的商務辦事機構和公共活動場所，如布業會館、錢業會館、鹽業會館、泥木業會館、船業會館等等。地域性會館是由旅居一地的同鄉人共同興建的一種能提供聚會活動和食宿服務的公共建築，如山西會館、陝西會館、福建會館、安徽會館等等。還有一些會館則是綜合了上述兩種性質，例如四川自貢的西秦會館就是由陝西的鹽商所建的一所鹽業會館，既是地域性的又是行業性的。

會館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商業貿易和地方文化交流發展的產物。其建築在功能性質上具有很大的綜合性特點，建築形制上具有兼容性，既有某些官式建築主體布局方式及形制特徵做法，又較多地採用了地方民間建築的做法。在藝術風格上既有商業化氣息，又有地方文化特色。這使它在中國古代各種建築類型中獨樹一幟，不論在功能布局、空間組合，還是在建築的技術和藝術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可以說它是中國古代民間建築最高成就的體現，同時又反映了各種地域文化的特點，是中國民間建築技術藝術的典型。

一、會館建築的起源和發展

會館的產生是中國古代商業經濟的發展和傳統文化心理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

中國古代以農業為立國之本，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體，手工業、商業相對落後，且不受重視，城市經濟發展緩慢。商人的社會地位低下，商業的發展受到嚴格控制。唐代以前，中國在城市中實行里坊制，城市街道和市民居住的里坊內不許設商店。商業活動都集中在城中的兩個街區，稱之為『市』。如唐代長安城內就祇有東西兩個『市』。在商業區內，經營同一類商品的店鋪、作坊集中在一起，組成『行』。例如唐長安城中的東市西市就各有二百二十行。這種『行』本來是由官府為其管理和課稅的方便而組織起來的，後來便發展為商人和手工業者的自發組織商業行會，既為官府服務又帶有自我保護的性質。

宋代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高峰，打破了唐代以前那種嚴格管理控制的里坊制，城市面貌為之改變。大街小巷遍設店鋪，人口密集，貨物往來繁忙，一派繁榮景象。北宋末年翰林畫史張擇端所作名畫《清明上河圖》便是宋代都城汴京商業繁榮的真實寫照。這時期商業行會的發展更為普遍，其作用主要有三：①協調行業的內外關係，避免行業內部競爭，共同經營，利益均沾；②抵制外來人員經營，保護本行業經營的利益；③協助官府對行業的管理，征收賦稅，但同時也抵制官府的過分盤剝。這時行會的組織也更趨完善，每行都有自己的首領，叫『行頭』或『行首』、『行老』；外來的商人未經『投行』不得在當地經營。各行都有自己的規矩制度，甚至有自己的衣著裝束，走在街上，一看便知是哪一行的。到了明代，商品經濟又有了新的發展，開始出現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業商品經濟方式。由于交通運輸的發展，地區之間商業貿易逐步增加，東南沿海地區則出現大規模的海上貿易和港口城市。同時，手工業商業的地方特色和地區性分工日趨明顯，往往某一地區以出產某一類商品而聞名，如四川的藥材、浙江的綢布、江西的瓷器等等。地區性的貿易往來導致了大量流動性的行旅商人的出現，于是商業行會的形式也開始變化，從一種社會組織發展為擁有實體的組織，其中會館的出現就是行會組織發展及實力的體現。

會館的產生除上述經濟發展的原因外，還有社會文化心理上的原因。中國民族在祖祖輩輩長期固守于土地以農業為本的自然歷史條件下，形成了強烈的鄉土觀念。和西方民族那種到外闖蕩四海為家的心理習慣不同，中國人對故鄉，對故鄉人，有著一種特殊的親情。

『樹高千丈，落葉歸根』，『親不親，故鄉人』等，都是這種心理的表現。離開了故鄉彷彿總有一種不安全感。因此中國人不論到哪裏都喜歡組織『同鄉會』之類的組織。一個地方的人對其他地方的人或多或少具有某種排斥心理。旅居外地的人也必須組織起來對抗當地的勢力。這是會館之所以產生和發展的文化心理根源之一。

據考證，會館最早始於明代中期。明人劉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卷之四中有《嵇山會館唐大士像》一文，其中說：『嘗考會館之設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明嘉靖、隆慶）間，蓋都中流寓十土著，游閑屨士紳……用建會館，士紳是主，凡人出都門者，籍有稽，游有業，困有歸也』。到目前為止，尚未見有關於會館的更早記載。劉侗是明朝的進士，所寫的又是明朝的情景，其記載應當是準確的。從這一記載來看，會館一開始就不是純粹的商業行會，而主要是為流寓外地的同鄉人提供各種服務的場所，當然，這大量的流動人員中，最多的還是行旅商人。

會館的產生使商業行會的組織形式更加完備，過去較為鬆散的行會組織，現在有了常設的辦事機構和固定的活動場所。同時由於會館的作用超出了純商業性的活動，其性質也比原來的商業行會要複雜得多。會館中的行會組織或地方組織逐漸形成『幫』。這種本來為抵抗其他社會勢力，保護自身利益而組織起來的幫會由原來的純經濟性的聯合而到後來逐漸發展成一種政治性的組織，有的甚至發展成爲稱霸一方的強大社會勢力。

從明代後期到清代初期這一段是會館大規模發展的時期。由於明代經濟和商業貿易以及交通運輸的發展較爲迅速，地區性的商品交流大量增加，又由於明末清初時的戰亂等原因引起大量的人口遷移流動，致使商業性和地域性的會館在各地大量興起，并由大城市延伸到一些比較偏遠的地區。受到經濟、政治及地理條件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各地會館的發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在性質上也各有一些不同特點。

明清時期會館發展比較集中的地區主要有北京、河南、四川、湖南、江浙、福建、臺灣等地。河南地處中原，是聯結東西南北四方的樞紐，自古經濟繁榮，開封、洛陽等地古代就是有名的商業大都市，各地商賈雲集，大量興建會館。至今如洛陽、開封、周口、社旗、唐河、禹州等地仍保存有一些規模很大的會館建築。四川雖地處西南，然而地廣人多，物產豐富，且較少受戰亂的騷擾，水路交通發達，各地商賈雲集這一天府之地。過去四川全省幾乎每個城市都有會館，普及面之廣爲全國之首。現在成都、重慶、自貢、敘永、廣漢、宜賓、富順等地都還保留有相當規模的會館建築。江浙一帶自古經濟發達，魚米絲綢等曾經聞

名天下，且有長江、京杭大運河等重要水路交通。這裏也是商賈雲集之地，蘇州、上海、杭州、寧波、紹興等地過去曾有過很多會館，至今猶有遺存。湖南地處南北交通要衝，是北方以及西南各省與東南的廣東、福建交流的主要通道，貨物集散和人員來往頻繁。據志書所載，清代長沙有會館十幾所，洪江有『十大會館』，益陽有『四宮二殿』（均為會館）等等，至今在湘潭、黔陽、芷江等地還保存有會館建築。福建的會館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自元代開始，這裏就是中國海上貿易的門戶，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就從這裏起始，商業貿易明清時達到極盛。福州市以前的商業區臺江區就有會館二十多所。還有官方建的專門接待外國商人的館所，例如至今猶存的琉球館就是為日本商人建的。

與大陸隔海相望的臺灣，會館之多尤為突出。這是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造成的。這裏不僅受東南沿海商業貿易的影響，而且從根本上說這裏就是大陸移民和商人的天下。各地城鎮港口所建會館不計其數，至今保存下來的也很多，如臺北、臺南、淡水、鹿港、澎湖等地均保存有一些相當完好的會館建築。臺灣的會館還有一個大陸的會館所沒有的特點，即由軍隊建的會館多。這是由特殊的歷史原因形成的，清朝政府鎮守臺灣不用當地人，而是從大陸派兵，這些大陸去的官兵以同鄉關係建立起許多會館。例如臺南的桐山營會館、銀同會館、安平海山館，臺北和鹿港的金門館，澎湖的媽祖宮、提標館等等均屬此類。

會館最多，最集中，形式和特點最豐富的當然首推北京。這裏是明、清兩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各地紳商、地方官吏、趕考的學子等等大量雲集京都。北京的會館之多難以計數，僅據清朝學者李虹若所著《朝市叢載》一書中所載有名稱和地址的會館就有三百九十二所。該書寫于清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此後直至清朝末年，民國初期仍不斷有新的會館出現。從《朝市叢載》的記載中可看出北京會館發展的大體情況和特點：①人員複雜，純商業性會館不多，主要是旅京的同鄉人建的地域性會館。書中所載北京本地的行業會館僅九所，其他均為外地人所建。因而在會館名稱上有的乾脆就叫『邑館』、『鄉祠』，如『山會邑館』、『長沙邑館』、『直隸鄉祠』、『浙紹鄉祠』等。各地的駐京會館又分為省級和州縣級的。有的省級會館同時有好幾所。例如『河南會館』，與其并存的又有『中州老館』、『中州新館』、『中州南館』；與『四川會館』并存的又有『四川老館』、『四川東館』、『四川南館』等。市縣級的會館有的也同時有幾所，如『南昌會館』、『南昌東館』、『徽州會館』、『長郡會館』、『長沙郡館』、『長沙邑館』等等。這些會館的性質和人員均很複雜，錯綜交織。②地點、區域相對集中。北京的會館主要集中在城南市區，即正

陽門、崇文門、宣武門外一帶。京畿之地，等級森嚴。劉桐的《帝京景物略》中記載：『內城館者，紳是主，外城館者，公車歲貢士是寓』。清代實行滿漢分住制，強令明代建于內城的會館遷至外城。在各地京人員中以地方官吏、商人、趕考的學子三類居多。清政府六部設在正陽門內，因而官吏多從正陽門出入；崇文門設有稅關，管理商務，商人們多出入此地；參加會試的考生則從宣武門出入。并且前三門外，即今前門大街、大柵欄、天橋、珠市口一帶過去一直是北京商業和市民文化最集中的區域，因而會館也就大多建在這些地區。相對來說，商業性的會館主要集中在崇文門外；而一些主要為趕考學子而建的試子會館則大多集中在宣武門外。專為趕考學子建會館，這又是北京會館的一大特點。一年一次的鄉試和三年一次的會試都有大量考生匯聚北京。明朝定都北京後共進行七十七次科舉考試，中進士者二萬二千六百九十四人，清朝在北京進行過一百一十四次科舉考試，中進士者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人，此外還有大量未中榜者，參加考試人數之多可以想見。考試中榜者是地方的榮耀，同時還可封朝廷官職，因而地方紳商也很樂意為試子們提供方便。有的會館乾脆就是專門為試子而建的，名稱也為『××試館』，如有『天津試館』、『遵化試館』、『廣州試館』等等。③各省駐京會館數量不均勻，這一點大概也反映出當時各地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發展的情況不同。從《朝市叢載》的記載中可統計出清光緒年間各地駐京的會館有：直隸一十二所，河南一十四所，山西三十六所，山東八所，陝甘二十六所，江蘇二十六所，安徽三十五所，湖北二十四所，江西六十所，浙江三十五所，四川一十五所，湖南一十八所，福建一十九所，廣西七所，廣東三十二所，貴州八所，雲南九所。從這一統計數字雖不足說明各地經濟發展狀況，但也大體可看出各地商業發展和外出經商的習慣。明代元白道人所著《廣志鐸》中就有記載：『最愛出外謀生的南方人是江西人』。此外，江南出才子，赴京趕考的也特別多。清朝歷次科舉考試獲進士及第前四名的大多來自江南各省，以江蘇、浙江人最多，其次是安徽、江西等，因此這些省在京建的試子會館也多。

近代以來，民主革命風起雲湧，北京的會館成爲維新志士和革命者的活動場所。著名的『戊戌變法』運動就是首先從這些會館中醞釀起來的。康有爲多次赴京，寓居于南海會館內的『七樹堂』（現爲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保存完好），在這裏寫了《上皇帝書》，并聯絡廣東、湖南等會館的舉子在河南會館內集合。一千三百多舉子簽名向朝廷上書，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事件（因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由公車接送，因而稱這些舉子爲『公車』），拉開了戊戌變法的帷幕。與此同時，康有爲在南海會館內創辦進步刊物《中外紀聞》，組織

了『強學會』。梁啓超赴京寓居新會館內的『飲冰室』，在這裏著有《飲冰室文集》，協助康有為組織維新運動。譚嗣同人京住在瀏陽會館，積極開展維新運動。維新運動失敗，譚嗣同就義後，瀏陽會館專闢其居室『莽蒼蒼齋』為祭堂，每年正月初一，湖南在京各界人士會集瀏陽會館致祭悼念，直至一九四〇年，日軍占領北京館人盡散方止。此外，南海會館成立『粵學會』；福建會館成立『閩學會』；四川會館成立『蜀學會』；雲南會館成立『滇學會』等等，這些地方均成為維新派的活動場所。辛亥革命時期，北京的會館又一次成為革命派活動地。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在湖廣會館、安慶會館、粵東會館等處均留有他的活動足跡。尤其是湖廣會館，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國民黨成立大會在此召開。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促進會聯合成立國民黨，孫中山先生出席大會，宣布了國民黨黨綱，並當選為國民黨理事長。該會館因此而成為重要的革命歷史紀念地，現為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主要建築保存完好，并于近年修繕一新。此外，北京的廣東香山會館為紀念孫中山先生，在先生逝世後改名為中山會館。

新文化運動和民主革命時期，北京的會館又為一些社會活動家和革命者的活動提供了方便。魯迅先生在民國教育部任職期間寓居北京宣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長達七年多，在這裏他寫下《狂人日記》、《孔乙己》等許多名作，為新文化運動而呼號吶喊。李大釗、陳獨秀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在北京車單米市大街的安徽涇縣新館內創辦了進步政治刊物《每周評論》。一九一九年四月《每周評論》揭露了北洋政府章宗祥等人的賣國行徑，引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愛國運動。李大釗還在浙江鄞縣西館內成立『少年中國學會』。陳獨秀也常到安徽安慶會館內聯絡同鄉，宣傳革命。一九二〇年，湖南軍閥張敬堯鎮壓進步學生運動，毛澤東率湖南各屬驅張代表團赴京，住在宣武區爛漫胡同的湖南會館內，并在這裏召開了數千湖南籍旅京各界人士參加的『湖南各界驅張大會』。該會館內部分建築現仍保存完好。

北京的會館是全國會館的縮影，但其性質和作用却遠比其他地方的會館要複雜得多。尤其是近代歷史上的風風雨雨，更體現出會館社會功能的某些特殊性，它們仿佛是相對獨立於社會之外的一個小天地。由于其起源、性質和作用上的特殊性，會館的建築形式也與其他地方的有所不同。祇可惜保存下來的已經不多。目前保存較完整，規模較大的僅宣武區虎坊橋的湖廣會館（即孫中山成立國民黨的舊址）一處。還有少量僅保存有部分建築，大多數已完全消失。

在中國會館的發展史上，還有一個值得特別重視的方面，那就是各地會館分布的地域性

特點。除北京的會館較多地帶有政治性色彩以外，其他地方的會館一般都是經濟性的。因此，一個地方會館的多少，說明那裏經濟的發展狀況，尤其是商業貿易的發展狀況。從全國各地會館建築的建設情況來看，會館的大量出現并非祇限于繁華的大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而在一些今天看來很偏遠的地方過去也有很多會館。這主要是因為交通運輸的原因，古代的商貿運輸主要是靠水運，河流便是主要的交通要道。尤其在一些省和省交界處又有河流經過的集鎮，往往形成為地區間商業貿易和貨物集散的中心。例如山東聊城，明清時期為京杭大運河沿岸九大商埠之一，被稱為『挽漕之襟喉』，『江北一都會』，北方各地商賈雲集，生意興隆。河南的社旗（古稱賒旗，又叫賒店），全鎮有七十二條街，按行業集中，分為瓷器街、銅器街、山貨街等，商業之繁榮可以想見。類似的情況還有河南的周口、唐河，陝西的丹鳳、山陽，安徽的亳州，四川的自貢，湖北的谷城，湖南的黔陽、洪江等。這些地方都有河流經過，都曾經是繁忙的船運碼頭，省際間商貿集散地，但隨著近代公路、鐵路的發展逐漸取代河流為主要運輸手段，商貿中心也逐漸轉移，這些曾經繁榮一時的商貿市鎮也逐漸衰落乃至被人遺忘。今天這些地方保存下來的那一座座華麗的會館建築，似乎還在向人們展示著這裏過去的榮耀和歷史的滄桑。

由此可見一部會館的發展史幾乎就是一部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和社會文化的發展史。

二、會館建築的使用功能與空間構成特徵

會館建築在中國古代建築中是一種滿足特定社會需求的城鎮公共建築。從其產生、發展的歷史及文化根源來考察，它是城市中某種特定集團的活動場所，雖然不排除在某些喜慶、娛樂活動時有該行業以外的人參與，但就其使用性質及管理方式而言，它屬於一種特定人群活動的場所，不是向全社會開放的公共建築。

會館建築的主要使用功能一般包括提供行業組織、同鄉會常設機構辦事、聚會、議事及娛樂場所，同時設有接待同行商旅、同鄉會旅客住宿用房，而且大多數會館由于行業性質或地域文化關係信奉某種神靈、崇拜某種偶像而設有特定拜祭空間，如福建會館多供奉媽祖，祈求出海、行船平安。自貢鹽業會館衆多，其中燒火煮鹽工匠具有一定行業規範技術，因而

成立同業公會設立會館。他們供奉火神作為精神支柱，一方面進行行業保護，另一方面則祈求燒煮鹽鹵的生產安全。會館建築的功能除上述之外也常被作為婚喪祭事、假日聚會的場所；會館的這類聚會多則人氣興旺，可以顯示行、幫的聲勢。因此會館建築是一種多功能、多空間構成的綜合性公共建築。

會館建築空間構成及布局與功能有密切的關係，同時也受到歷史與社會觀念的影響。會館建築的空間組成一般包括大門、戲臺、殿堂、廂房及庭院等基本部分。一般會館建築的大門與戲臺合建在一起，但隨會館建築的規模不同其大門與戲臺也可分開設立，殿堂的數量也可由一個增至數個，廂樓一般是會館辦公、議事及住宿的用房，多數布置在一側或兩側，形成相對獨立的院落，構成自成一區的住宅或辦公空間。規模更大的會館則由多個院落構成。

會館建築的空間布局較自由，一般具有民間建築的手法。同時會館建築也是某一行會的權力及力量的象徵，且供奉神靈及偶像，因此在主體建築部分也往往採用沿主軸綫對稱布局的官式建築手法，即沿大門、戲臺、內院、月臺、殿堂形成一條主軸綫。如芷江天后宮（亦稱媽祖廟，實為福建會館），在中軸綫布置大門、戲臺、觀戲坪、正殿及寢宮，在右側布置財神殿及其他住房，布局隨地形而變，空間自由延伸。建築內部設有戲臺幾乎是所有會館建築的共同特徵，反映會館建築公共活動及娛樂的功能性質的特點，利用大門上層樓面作為戲臺，同時可以利用內院作為觀衆廳，一般逐步升起在殿前加做月臺，使觀衆有較好的視綫。反過來，當前殿舉行祭祀儀式時，內院也是聚會的場所。會館建築的前院一般都是在兩側用廊廡或廂樓把戲臺與前殿聯結起來，形成四周封閉的庭院。兩側廂樓內可作小型聚會之用，外廊則為看戲時的看臺，使用方便。規模較大的會館在兩側廂樓上建鐘鼓樓或亭閣。而後殿則常建樓閣，較多是從後殿兩側伸出廂樓與前殿相接，形成較小後院，前後殿及廂樓圍合一個共享空間，這是供內部使用，相對安靜的環境。四川成都洛帶鎮的湖廣會館等均採用這種手法。

會館建築在空間藝術上相對其他古代公共建築（宮殿、神廟等）有著明顯的特點，空間一般沿兩至三條平行的縱軸綫展開，各自形成封閉的內院，相互之間以牆分開，避免干擾，祇有旁門相通，各院落空間對外封閉對內開敞。狹窄的廊道與開敞的空間形成強烈對比，不僅空間富于變化，而且由于明暗、寬窄、封閉開放空間效果形成建築空間節奏感。同時會館建築的空間多采取民間建築的尺度，因此雖然建築體量較大、空間豐富，但內部空間宜人。

三、會館建築的構造特徵

古代會館是一種公共建築，祭祀、聚會、演戲等公共活動需要較大的空間，如何在木構體系的材料技術條件下獲得儘量大的內部空間，取決于合理的構造方案。中國古代建築體系中的基本結構形式為擡梁式和穿斗式兩種，一般來說擡梁式可獲得較大的空間，但用材粗壯，而穿斗式，雖用材較小却柱網較密，內部空間受到限制。在北方地區采用擡梁式較多，反映其受官式建築影響較大，南方民間建築多采用穿斗式結構，兩者都存在怎樣獲得較大內部空間的問題。經過長期的實踐，民間工匠創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辦法，最主要有以下兩種，一種是變換結構方式；另一種是多屋架組合方式。

所謂變換結構方式，是指穿斗與擡梁的混合結構形式。具體做法是，主體構架為穿斗式，不必增加承重柱的直徑，而加大梁的斷面尺寸，把原為穿枋的形式變為實際上是梁的形式，并略為往上拱起，做成月梁（民間形象地稱之為『冬瓜梁』），下面以綽幕枋加固，其上不再做穿斗式的騎馬瓜柱而是做擡梁式的童柱（因柱下做裝飾性花式柱墩，民間稱之為『童子坐蓮花』）。如此層層疊起，便形成穿斗式上的局部擡梁。這種做法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兼有兩種結構形式的優點，同時使露明的屋架在視覺效果上避免了普通穿斗式構架的簡陋。

所謂多屋架組合，是指在一個屋頂的跨度達不到所需要的室內尺度時，采用多個屋架組合而得到較大室內空間的結構形式。中國傳統建築體系的結構形式受到材料性能的限制。木構架中橫向承重的梁枋的跨度是非常有限的。就一般木構架形式的承重梁來說，雖然有三架、五架、七架、九架之分，但真正做到九架的極為少見，一般都是五架、七架，即使是皇宮大殿也不過如此。如宋《營造法式》中的殿堂大木作，直接承載于中央兩列內柱上的梁祇有五架；北京故宮太和殿，直接承載于金柱上的梁也祇有七架，如此大的頂和上部構架的重量，若要做九架梁，其梁的斷面尺寸會大得驚人。而對於民間建築來說，其材料來源和財力上的條件遠不如皇宮建築，不可能做成如此大跨度的屋架。然而其使用功能又需要較大室內空間。于是民間匠師們便創造了這種多屋架組合的結構形式。多屋架組合一般由兩到三個屋架以前後并列方式組成。這種多屋架組合按其結構形式又可分為『真型』和『假型』兩種。

所謂『真型』組合，即是由多個（一般是兩個）完全獨立的構架、兩個屋頂連在一起而合成一個室內空間。通俗地說就是兩棟房子合成一個廳堂，或者說一個廳堂兩個屋頂。這種

組合，其結構上兩棟是相互獨立的。而兩屋面的檐口相接，兩端山牆將兩棟建築連在一起。中間屋檐相接處設排水天溝，將雨水引向兩端山牆排出。排水方式，有的地方（如江西景德鎮地區和安徽徽州地區）較早就使用了陶質雨水管，埋入山牆內。將天溝的雨水直接排入地下。也有將天溝直接伸出山牆之外排水的，則往往在出水口上作一些裝飾處理。如自貢西秦會館，將伸出山牆外的排水口做成一個張嘴的龍頭，每遇到下雨則龍口吐水，正入旁邊小庭院內的一泓水池中，不僅適用，而且成爲一處景觀，構思可謂巧妙。

所謂『假型』組合，即是把一個主體屋架的下部結構做成兩到三個屋架的形式，在下部的多個屋架上做『復水椽』，上面再蓋望磚或望板（一般明代做法蓋望磚，清代做法蓋望板），這之上再做草架。這樣，從外面看是一個屋頂，從裏面看却是幾個屋頂。這種方法是南方大型民間建築的主要做法之一，尤其在安徽徽州地區以及江西部分地區非常普遍。這種做法解決了建築、結構、材料多方的矛盾，一舉而數得，因而其做法合理而科學。

四、會館建築的藝術風格及裝飾做法

建築藝術是時空的藝術，它不僅隨著時間推移、地域的變化而產生不同的藝術風格，而且某一建築本身的形象也隨時間和空間移動給人以不同的感受。建築不祇是一種視覺的藝術，而且是來自人的多種感官所體悟的藝術，因此會館建築的藝術表現力與所有建築作品一樣，不僅來自建築外在的形式及裝飾，而且來自建築的空間形態、整體式樣及組成方式。

會館建築是爲某一特定社會人群（同業或同鄉）的共同需要而建的，由相同的社會觀念、價值觀念所認同的產物，因此在建築的藝術表現上必然有許多有別于其他建築的不同之處，體現出會館建築的藝術風格和裝飾做法的特徵。從大量的現存會館建築實例中可以歸納以下幾點：

（一）會館建築的空間構成及整體形態特徵

會館建築的空間構成及布局方式除滿足必要的使用要求之外，受到社會觀念及習俗的影響

響，各種行業、幫會爲了炫耀其勢力及行業中的權威作用，并受到禮制觀念的影響，在建築空間布局上都沿主軸綫布置大門、牌樓、戲臺及殿堂，以便供祭行業崇拜的神靈或宗師，突出其顯赫的地位，藉以建立行業、幫會的精神支柱。在這一中軸綫上，牌樓、戲臺華麗，殿堂高大，庭院空間寬敞，兩側再連接廂樓、廊廡形成封閉院落空間，暗示行業、幫會的自我保護格局。這種空間布局方法有別于一般民居，帶有宮殿、廟宇的色彩。但在會館的其他部分則兼收民居建築的精華，辦公議事及住宿部分空間布局自由，空間尺度宜人，構造方式多樣，因此它又明顯區別于官式建築，顯示出會館建築特有的空間環境氛圍及文化格調，如四川自貢的西秦會館。

(二) 會館建築的裝飾風格

會館建築是在中國古代商業、手工業發展的同時所產生的一種城市公共建築。無論來自城鎮的商人或是來自鄉村的工匠，都會給會館建築帶來許多民間的世俗文化以及強烈的鄉土觀念、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生活習俗，加上行業之間的自我保護與競爭，促成了會館建築文化化的形成。與其他類型的建築比較，除了建築的空間環境構成及建築形態之外，這種建築文化特徵還表現在建築裝飾藝術上。

會館建築藝術是民間文化觀念、民俗、民風、審美情趣及信仰習俗等在建築上的集中體現。會館屬于民間建築，在中國古代禮制等級制度下，民間建築不能超越宮殿、廟宇等建築的等級及形制，即使商賈、行幫有足夠的財力也不能把建築的規模做得過大，因而多在形式上追求豐富、多姿和奇特，并表現雍容華貴、絢麗精巧，藉以顯示其實力與財富，尤其是門樓、屋頂、戲臺等部位做得十分複雜而精巧。自貢的西秦會館很能代表這種風格。西秦會館的大門和戲臺的組合非常複雜，其平面是一進，而屋頂却是三進，大門的牌樓爲四重檐歇山，下面的三層在正面部分均被截斷向兩邊外移做成牌坊形式，往後又是一個更大的三重檐歇山屋頂，再往後又是一個三重檐的盔頂。從正面、側面及戲臺不同的面觀看屋頂各不相同，整個門樓屋頂飛檐翹角，如大鵬展翅，氣勢磅礴而又精巧華麗。

由此看出會館建築裝飾常常不拘一格盡其所能，調動各種手段及材料來達到目的。從油漆彩畫、石雕、磚雕、泥塑、木雕、琉璃、銅、鐵飾件乃至彩色瓷片等都用于裝飾，遠比宮

殿要豐富多彩，因而也呈現一定的商業色彩。其裝飾題材內容則是神話人物、歷史故事、戲曲場景、花草魚蟲、珍禽異獸、山水風景無所不包。

會館建築的裝飾重點一般集中在門樓、戲臺、正殿及兩側廊廡，規模較大的會館聘請名匠主持，做工精巧，手法多樣，追求華麗而繁瑣，使人眼花繚亂，世俗氣息很濃。如四川成都的廣東會館不僅正殿裝飾精美，後殿、廂樓、廊廡的裝飾也很講究。

(三) 會館建築地方風格的兼容性、混合性特徵

由于會館建築多半是由商人、手工業者或其他同業人員在旅居地所建，因此必然帶來原籍各地的技術、文化及習俗。在建設過程中雖然主要使用當地的材料及聘請當地的工匠，參照當地的建築形制，但因為會館建築是一種地方行業集團社會勢力的體現，因此必然注入原籍地方傳統文化觀念，全部或部分采用原籍傳統的技術及工藝。爲了顯示行、幫的力量，追求宏偉華麗的效果，以新異的形式達到超越他人的目的，往往在建築形式和裝飾手段上兼容并蓄乃至混合使用各種技術及工藝，這是與其他民間建築有很大區別的特點。也正是這樣使得會館建築形式及裝飾手法更加豐富、更加世俗化，并具有商業氣息。在現存的會館建築中，這種兼容性、混合性仍然明顯可見。如四川自貢的西秦會館，大量欄板、額枋使用北方建築常用的人物題材雕塑、彩畫及壁飾，而內部庭院處理却體現南方建築空間的小巧，部件及裝飾具有南方建築精細的格調，風火山牆也是仿南方民居的做法，南北手法兼容相得益彰。湖南芷江的天后宮又稱媽祖廟（福建會館），爲福建商旅所建，整個建築體系采用湘西地方民居的穿斗式結構及干欄式裝飾做法，但入口牌樓的屋脊却具有福建民居做法的特徵，并采用福建的灰色石雕描述福建的地方景致，具有濃烈的福建風情，整個建築體現湘西民居與閩南民居風格的混合。

山東烟臺的福建會館爲顯示其財力雄厚，竟將全部建築材料從遠隔千里之外的家鄉運來，力求保持福建建築的特徵，至今它仍是福建會館建築中最精美的一座。

四川自貢西秦會館爲保持其陝西地方特色，特交給陝西工匠建造，到了清道光年間建築已破舊，集資重修時因聘匠師發生矛盾，後來纔決定改聘自貢地區著名匠師楊學三主持，又另請來各地大批工匠，在此背景下雖然建築及裝飾奇特而精美，但手法混合多樣幾乎達到混